

【传统文化】
CHUANTONGWENHUA

中华传统

家谱文化常识

李万军 牛建军 赵斌◎编著

ZHONGHUACHUANTONG
JIAPUWENHUACHANGSHI



中州古籍出版社

传统文化

CHUANTONGWENHUA

中华传统

家谱文化常识

李万军 牛建军 赵斌◎编著

ZHONGHUACHUANTONG

JIAPUWENHUACHANGSHI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传统家谱文化常识 / 李万军, 牛建军, 赵斌编
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1
(传统文化)
ISBN 978-7-5348-4230-6

I. ①中… II. ①李… ②牛… ③赵… III. ①家谱—
中华文化—青年读物②家谱—中华文化—少年读物 IV.
①K82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5928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86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言

家谱是与家和家族有关的典籍，一向被认为是一家一姓的生命史，是一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具有辨别血统、敦亲穆族的特殊作用，具有悠久的修撰历史。由于修撰的时代不同，一般以宋代为界限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宋代以前时期家谱的内容还比较粗疏，到了宋代，家谱的体例和内容才基本固定下来。

生命，被赋予一种悲壮的美感。数百年的历史长河，数十位鲜活的面孔，在我们的记忆中徐徐展开，而葬礼的唢呐声，提醒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既然我们都要像叶子一样飘落到死神的怀抱，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记忆与现实，犹如树枝经纬交错，构成一部史诗般的巨著。细数过去其实也是凝视现在。因为我们身上烙下了前辈人的精神密码。吃着五谷杂粮长大的我们也许不懂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属于这部族谱。而流淌过数代人的血脉之河，注定会在我们身上传承下去。而这棵经历百年沧桑的家族之树，也必将依旧把它的根扎得更深，枝叶耸得更高。吹不尽的风倾听着它的故事。它屹立在漫长的时光之河里，显示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丰富的内涵，不仅充分表现出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统一性，而且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特点。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在中

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即使是在多次的政治纷乱、社会动荡中，都未曾被分裂和瓦解过；它的民族性则表现在中国广袤疆域上所形成的多元化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华文化又吸收了许多外来的优秀文化。它的辉煌体现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里，它的魅力体现在中医、饮食、民俗、建筑中。数千年来，它不仅滋养着炎黄子孙，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家谱基本知识

由来 / 1

家谱的发展与演变 / 5

家谱的名称和类型 / 14

家谱的内容和结构 / 19

家谱的字辈和堂号 / 24

家谱的避讳和谱禁 / 33

家谱的价值和利用 / 40

家谱的流传和收藏 / 47

家谱的记录与整理 / 52

家谱的纂修 / 59

一种特殊家谱——玉牒 / 66

第二章 传统亲族习俗

关于祠堂 / 77

关于祭祖 / 101

关于求子 / 130

第三章 中华家谱编纂常识

我国家谱的现状 / 151



- 旧家谱的一些通病 / 160
- 关于家谱的收藏与利用 / 165
- 为何要编修新家谱 / 169
- 关于新家谱的编纂工作 / 182
- 编修新家谱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 187
- 新家谱的相关内容和体例 / 192

第一章 传统家谱的基本知识

由来

大家都知道家谱,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 4000 年来,家谱在不同的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计数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侵蚀,流传至今的仍有 3 万多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与认识。

古往今来,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散居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各类家族,他们都有着各自共同的祖先,血缘关系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有贫富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即使是战争、瘟疫和各种自然灾害,也不能将他们分开。这些家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氏族是一个大家族,国家是一个最大的家族,国王或皇帝是这个家族的总族长,百姓是这个家族的子民,总族长利用各种手段和相当于血缘关系的纽带,维持和统治着自己的国家。

为了能使统治得到延续和稳定,权力更替和财产继承能够平稳实现,不致落入外人之手,无论是国家还是各个家族,都十分重视血统的纯净,为此,记录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谱牒就应运而



生了。

关于家谱起源的具体时期,历代说法不一,归纳一下,可以看出,传统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战国秦汉起源、周代起源、殷商起源等4种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然而,如果我们在文献的基础上,再运用考古学、民俗学等方法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家谱的产生时代远远早于上述四说。应该说,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家族世系就曾以结绳、口述等方式存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很多民族的发展史中得到验证,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会例外。

从文献角度看,早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夏朝,王室就有了记录自己世系的谱牒,这就是夏王室的家谱。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家谱,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帝王诸侯世谱》等通代谱牒。汉代著名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创作其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时,就曾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实地游历、考察所得,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完整、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颡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以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谱,编成《十二诸侯年表》。遗憾的是,这些原始的家谱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早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见到后人辑佚、整理的部分本子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

令人欣慰的是,在传世的甲骨文中,却还保留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释读,共有3件甲骨片可以确认为是最古老的家谱:一件最早见于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序号为209;一件最先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序号为1506;一件最初见于董作宾的《殷墟文字乙编》中,编号为4856。第一、第三件文字不多,价值相对差一些,第二件“库1506”为一大片牛肩胛骨,1903年左右为美国人方法敛收藏,今藏大英博物馆,所载文字是一极为完整的、典型的商人家族世系。有关本片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认为是伪刻的有胡小

石、董作宾、郭沫若、容庚、唐兰、胡厚宣等先生,认为是真品的有张政烺、陈梦家、于省吾、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不过,近年来的学者大多认为是真品。全片从右到左,共13短行,每行一句,除第一行为5字外,其余12行均为4字,行间无直线。

他将这件甲骨片定为武丁时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十世23任国王,距今大约有3200余年。这件家谱一共记录了几氏家族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的11人,兄弟关系的2人。也就是说,这件家谱共记录了这个家族11代的世系。通过这件家谱实物,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有了以表格形式记录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谱了。此外,这3件实物资料上的人名,均未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之中,显然,他们都不属于商代王室成员。由此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3200多年之前,不仅王室,就是其他一些显贵家族,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记载的家谱。“库1506”家谱共有11代世系,以每一代世系30年计,这个家族有家谱的历史又可上推300余年,这件家谱实物年代之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上述3件家谱实物之外,在现存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商人求祷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祭祀谱。这些祭祀谱,原本是为祭祀用的,它们有的求祷于自己的祖先,有的记载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则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从而形成了一连串的世系。同时,这些祭祀谱上往往还有诸如祈祷用语、祭牲数目、祭祀日期等内容,因而它们与专门记述家族世系的家谱有所不同。然而,由于它们记载的均为同一家族的世系人物,并逐代排列,有条不紊,则又与家谱在性质上有些相同。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祭祀谱是家谱的初级形式,它们所记载的家族世系资料,为专门家谱的纂修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代的这些祭祀谱,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家谱,它们的产生年代可能要略早于专门记述家族历代父子世系的家谱。

在现存的商朝末年的青铜器中,也有几件是属于专门记载商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3件同时出土于易州(今河北易县)的青铜戈(文物界称作“商三句兵”),3件铜的



铭文释读分别为：

一

大
祖祖祖祖祖祖
日日日日日日
己丁乙庚丁己己

由于第一行“大祖日己”与其余 6 行的“祖”不是一辈而排除，因而本戈又被称作“六祖戈”。

二

大大中
祖父父父父父
日日日日日日
乙癸癸癸癸癸己

由于第一行“大祖日乙”与后 6 行的“父”不是一辈而排除，因而本戈又被称作“六父戈”。

三

大
兄兄兄兄兄兄
日日日日日日
己戊壬癸癸丙

由于本戈共列有 6 位兄，因而又被称作“六兄戈”。

对于它们的铭文内容中的一些具体所指，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对其是记载同一个家族世系的家谱却是大致认可的，更有学者认为，这 3 件铜戈的铭文记载了同一个家族 6 到 8 代的谱系。此外，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还著录了一件被称作“祖丁戈”的青铜戈，它的铭文虽然只有“祖丁祖己祖乙”6 个字，但从商人多以干支命名的特点看，它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记载一个家族三代祖先名字的家谱了。

在周代，铸记家族世系于鼎彝之风盛行于全社会。在流传至今的周代青铜器中，由于各种器物铸造时代的先后和家族地位的高下不同，其铭文中所记载的家族世系数和功勋、庆赏事迹等内容的详略程度也不一样。如“对盨（léi）”、“昌尊”两件器物的铭

文中就记录了包括制器者在内的父、子两代世系,而在“祖丁父癸彝”和“祖丁父己壶”两件彝器的铭文中,则记载了不包括制器者在内的祖、父两代世系。

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关世系的记载,仅仅可以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形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文字并不是最早和唯一用于记事的方式。如前所述,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就普遍采用结绳和口述的形式来记述各种大事,其中自然也就包括家族世系。由此就形成了两种更为古老、更为原始的家谱形态,这些原始形态的结绳与口述家谱,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对比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残存到近代和现代,成为民族家谱中两种很重要的组成形式,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中见到些许痕迹。

我国家谱文献的起源很早,可家谱专词的出现却晚了许多,但具体出现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见到的最早记录,是六朝时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曾引用了《王氏家谱》,而唐初李善《文选注》中则不仅引用了《王氏家谱》,还引用了《颜氏家谱》。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有《杨氏家谱状及墓记》。这几部家谱,当为南北朝时人所撰。我们知道,某一词语被用作书名而存在,理应是在使用比较广泛、词义相对成熟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家谱”一词的出现时代,虽限于资料不敢妄断,但是最晚不过南北朝,应该是不会错的。

家谱的发展与演变

自我国夏商以来,不仅王室有家谱,而且诸侯及一些贵族也都有自己的家谱,专门记录家族世系,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其主要职责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战国时期,有人对这些家谱进行整理,编有《世本》15篇,集中记录了黄帝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相传,荀子也曾编有《春秋公子血脉谱》,此



书今已佚,可“血脉”二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本质。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十分重视并大量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谱牒资料,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上古时期,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全,导致许多记载已不可靠,只能旁证于家谱之类家族文献和其他野史、传闻,而这些资料又已基本亡佚。由于这个原因,《史记》所记述的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系历史的权威性大大增强,《史记》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历史的最权威著作。

春秋时期,各国王室的家族事务由政府专门设置的宗正来管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王室家世记载和家谱编纂,而民间的家谱基本处于自流状态。秦代虽设有宗正管理皇族事务和皇室家谱,但由于时间较短,因此秦代家谱一直未见记载。

汉朝建立后,因袭秦制,设立宗正和专门机构管理皇族事务和掌修皇亲贵族谱牒。宗正之名经过几次变更,到东汉时又被恢复。宗正由皇族中人担任,掌管的皇族谱牒包括两种:一为属籍,收录以皇帝为核心上下五世直系亲属的名籍,因此,可以看作是皇帝本人的家谱;另一为诸王世谱,收录各同姓诸侯王的世系谱籍。此外,还有专门机构管理异姓功臣所封为王、侯的家族世系谱籍——侯籍。这些皇亲贵族的家族谱系现均已亡佚,有关内容只保存在当时和后人所写史书如《汉书》、《后汉书》的某些表和列传之中。

西汉中期以后,宗族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附着于宗族藤蔓之上的家谱,尤其是私人家谱的修撰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增长,这从司马迁《史记》中就可看出。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总结和记录了所记人物的家族世系,同时,在《太史公自序》的开头部分,还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家族世系,可称是司马氏家谱的简本。自此之后,文人雅士纷纷仿效,较为著名的有扬雄、班固等。另外,从《后汉书·袁绍传》中也可看到,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不仅有家庙,而且有家谱,族中立有嫡嗣,必须告于祖庙,载入家谱。所憾者,这些家谱资料除极少数原存于相关史书之中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均已基本亡佚,并且绝大部分未见其他各种文献著录。

汉代家谱,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帝王诸侯世谱》20卷,以及《扬雄家牒》、《邓氏官谱》、应劭《风俗通义·姓氏》和颍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实物,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立的《三老碑》、桓帝延熹三年(160)五月立的《孙叔敖碑》和灵帝光和三年(180)立的《三老赵宽碑》。《孙叔敖碑》的碑阴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和东汉初任渤海太守的孙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世代显贵,《三老赵宽碑》由汉初始,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此两碑均十分完备和详细,因而可以看作是汉人的石刻家谱。汉代的文献家谱现均已亡佚,通过这几块碑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汉代家谱的基本情况。汉代的家谱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作用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著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由于此时家谱一般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别人代修,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家谱的一大特色。

东汉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是“察举”,即根据社会评论来判别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任用。评论必须由社会头面人士进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目光只能停留在同阶层的圈子里,这样,门第和家世就逐渐重要起来。东汉末年,魏王曹丕在尚书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它以士人的籍贯、门第作为主要标准。这种选士方法,当时被称为门选,是整个南北朝时期取士、任官的最主要方法。根据门第来选官的最终结果是强化和保证了门第等级的尊严,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宗、联姻等方式挤入高门第,分享特权和既得利益。这种选官方法,既强化和巩固了门阀制度,也从制度上保证了士族内部按门阀上下、族望高低、势力大小来分配官职。士族内部各品级之间以及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鸿沟难越。品级高的士族排挤、鄙夷品级低的士族,品级低的士族又排挤、鄙夷士族之外的庶族。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因此,整个南北朝时期,为了选官便利和证明身份,无论是政府还是豪门势族,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纂修。这就形成了中国谱牒史上公私修谱的第一个高潮。



造成南北朝时期国家和民间均重视家谱,形成我国家谱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原因,除政治上的选官之外,还有社会生活中的婚姻门第观。门阀制度形成后,世家大族不仅要保持政治特权,还要求保持婚姻特权,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讲究阀阅相当,以保持贵族血统的纯粹。于是,士族与士族、庶族与庶族、上层士族与上层士族、下层士族与下层士族、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中原士族与中原士族、少数民族汉化士族与少数民族汉化士族等都形成了各自的婚姻集团。不同等级家族之间的通婚行为是要受到社会责难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朝萧齐时士族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而遭到沈约的弹劾。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祖与父均官居清显之位,按沈约的话是,王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富阳满璋之,家境殷实,欲为儿子满鸾娶妻。当时王源正值丧妻,且家贫,于是,动了将女儿嫁给满氏,得聘礼钱五万给自己纳妾的心思。为此,他还特地查过满氏家谱,认定富阳满氏是高平满氏满宠、满奋的后裔。满宠在曹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西晋时为司隶校尉,满璋之和满鸾也有官职。可就是这样,还是不行。沈约认为,富阳满姓,没有确凿的士族根据,满奋死于西晋,其后代在东晋没有显赫声迹,满璋之自述家世应该是伪造的,王源与之联姻,是唯利是图、蔑祖辱亲、玷辱士流之举,应该罢免王源的官,并禁锢终身。由此可看出,当时的士庶界限是何等分明。在北朝也有类似之事。北魏崔巨伦的姐姐“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叙胤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逝,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为了不使瞎了一只眼睛的侄女下嫁庶族,保住家族门第,不惜牺牲亲生儿子的幸福,纳为儿媳。这种行为,在当时竟被视为义举。为了婚姻的门当户对,士族不仅重视自己的家谱撰写,同时也注意对通婚对方家谱的考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的家谱繁荣。

门阀制度下的士族特权还表现在不服国家徭役上。为了摆脱繁重的国家徭役,不断地有人投献到士族家中充当私户,高明者则伪造家谱,冒充士族。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服国家徭役的人口越来越少。为了稳定政权基础,增加国家徭役来源,南北朝时期,政府

不断地清厘户口,即厘改谱籍,清除冒充的士族。这也是南北朝时期政府重视谱牒,不断重修总谱的经济因素之所在。

形成士族自觉修谱的另一个原因,是士族间的高自标赏。晋室南迁后,北方士族随之而迁到南方的有百家之多,虽然他们与南方土著士族混居杂处,然而并不合流,互相轻视,于是,就各自修谱自重,高标郡望,以区别于他支别派。留在中原的士族,也不愿与那些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士族相混淆,为保持和炫耀自身血统的纯净,亦竞相纂修家谱,以区别那些汉化的少数民族的世家大族。这种南北之别、华夷之辨,可以说分别促进了南朝和北朝谱学的发展。此外,东汉末年以来,一些大家族为躲避战乱之害,聚族而居,据险自守,出现了许多坞壁,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为提高家族内的凝聚力,编修家谱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

由于家谱在政治、婚姻等方面作用的剧增,南北朝时期家谱得到了极大发展,政府设置“谱局”,专门编修谱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设“谱库”一类机构,收藏谱牒,以备不时查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更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且还形成了几代传承的谱学世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贾家,从东晋时贾弼,到其子贾匪之,孙贾渊,曾孙贾执,贾执之孙贾冠,一门五代,代有传人。另外一个著名的谱学世家是琅邪王氏,虽不是父子嫡传,但也是同一家族中,连续几代,代有名人。除此之外,著名的谱学专家还有曹魏时的管宁,西晋时的虞挚,刘宋时的刘湛,萧梁时的徐勉、傅昭,陈朝的孔奂、姚察,北魏的高谅、李神,北齐的宋绘等。对于谱牒,上流社会人人都须了解和研究,不然不仅影响入仕、婚嫁,而且一般的社会交往也难以进行。南朝时士人尤重家讳,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尔提到他父、祖的名讳,那他当场会号啕大哭,让你下不了台。史书记载,刘宋时一位名叫王弘的人,也就是王氏谱学的创始者,“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传为一时佳话。萧梁时吏部尚书徐勉也是如此,不仅选官时“彝伦有序”,就连日常待客,也是应对如流,皆为避讳。这是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一种境界,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虽然北朝人相对而言不如南朝人那样讲究谱牒之学,但对于避讳也同样留意,不敢轻率造次。如北齐孝昭帝高



演，“聪敏过人，所与游处，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大臣们则更不用说了。

为了能使家族等级区别清楚，南北朝时期人们除了编有本家族的谱牒之外，也编有如《百家谱》之类的郡姓、州姓谱，将本州、本郡的大小家族，三六九等地区别记录各自的世系。据萧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记载，当时的谱牒著作就达1000余卷。那时的寒门素族，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与士族攀婚之外，只有伪作高门，诡称郡望了。他们通常买通谱学专家篡改谱牒，但此事如被揭露，在当时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南齐时著名的谱学家贾渊就因帮助一个叫王泰宝的人篡改谱牒，冒充当时的士族琅邪王家而被人告发，差点儿丢了脑袋。

南北朝时期家谱如此重要，因而一切能证明家族身份、氏族等级的文件、资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内容，流传至今的一些墓志铭和史书都不例外。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位列封建时代二十四部正史之一的《魏书》，更是一部家谱式的正史，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余人。《宋书》、《南史》、《北史》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情况，因而为后人所讥。南北朝时期的家谱现在已基本亡佚，这些史书为我们保留了一批相当完整的谱系资料。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谱牒发展的第二个高潮。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均出身于豪门士族，因而对于谱牒维护统治者利益、巩固政权的作用非常清楚。此时门阀制度也很盛行，但与南北朝时期有所不同，首先隋唐取士大多通过科举制度，不唯门第，与门第关系不大。其次，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士族衰落了，消亡了，另一批军功贵族崛起，产生了一批新的豪门，构成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和主体。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基础，唐王朝的谱牒修撰权基本为官府所垄断，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编写了数部大型的谱牒著作。唐代政府修撰的谱牒，均为政治作用明显的姓氏谱和衣冠谱，比较著名的有《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唐皇玉牒》等，都是皇皇巨制。官修谱牒，成为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以谱牒形式将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